



# 多维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

彭树欣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多维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

彭树欣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880 页超豪华大开本  
封面设计：陈国奇，责任编辑：魏巍，责任印制：王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 / 彭树欣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647 - 1907 - 4

I. ①多… II. ①彭…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文献学—研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308 号



出 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610031

策划编辑：陈松明

责任编辑：谭炜麟

主 页：[www.uestcp.com.cn](http://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uestcp@uestcp.com.cn](mailto: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张 15 字数 22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47 - 1907 - 4

定 价：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028-83202463；本社邮购电话：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181	.....	梁启超与佛学博士于氏妙法真宗	二
881	.....	宋白的类代学园图书馆	三
871	.....	梁启超文学文稿真集	章六策
871	.....	梁启超文学文稿十景背诵诗文选辑	七
181	.....	梁启超对传统概念概念“经学”与“国学”的认识	八
351	.....	梁启超与《史记》、《汉书》与《后汉书》	九
321	.....	梁启超与《左传》、《国语》与《史记》	十
281	.....	梁启超与《周易》与《春秋》	十一
261	.....	梁启超与《诗经》与《楚辞》	十二
263	.....	梁启超与《国语》与《左传》与《史记》	十三
<b>第一章 梁启超文献学之研究（上）：梁氏的“文献学”概念</b>		<b>1</b>	
113	一、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	1	
113	二、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0	
<b>第二章 梁启超文献学之研究（下）：梁氏文献学的新走向</b>		<b>38</b>	
113	一、古代文献学发展的两种主要路向	38	
113	二、文献整理和研究普及化方向的出现	45	
113	三、梁启超对文献整理和研究普及化方向的探索及其意义	50	
<b>第三章 梁启超目录学之研究</b>		<b>66</b>	
113	一、梁启超在导读书目上的发展和影响	66	
113	二、梁启超对佛经目录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88	
113	三、梁启超：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现代第一人	99	
<b>第四章 梁启超辨伪学之研究</b>		<b>105</b>	
113	一、梁启超辨伪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105	
113	二、梁启超辨伪学的成就	117	
113	三、梁启超辨伪学理论的影响	139	
<b>第五章 梁启超哲学之研究</b>		<b>147</b>	
113	一、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	147	

二、梁启超对孔子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	157
三、梁启超国学分类的启示.....	168
<b>第六章 梁启超文学之研究.....</b>	<b>173</b>
一、梁启超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文学活动.....	173
二、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181
三、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整理问题.....	187
<b>第七章 梁启超文化学之研究.....</b>	<b>192</b>
一、梁启超的西学思想.....	192
二、梁启超“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观的演变.....	199
三、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208
<b>第八章 梁启超新闻学之研究.....</b>	<b>216</b>
一、梁启超所办报刊传播效果评析.....	216
<b>主要参考文献.....</b>	<b>226</b>
<b>后记.....</b>	<b>234</b>



提出早出	王余光“文献学”既熟	魏昭君	章文海著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

# 第一章 梁启超文献学之研究（上）： 梁氏的“文献学”概念

## 一、梁启超：“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

关于梁启超与“现代”文献学的关系，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他对“文献学”概念的首创之功，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王余光说：“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sup>①</sup>张舜徽指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表达“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sup>②</sup>的观点。谢灼华则在《中国近现代学者文献观之发展》一文中，认为梁启超的文献学观点，一是广义的史学，一是国学，综而论之，梁启超所说的文献学，可理解为史料学或古典文献学。但是谢氏的论述比较简略，并认为梁启超对文献学“没有特别的新发展”。<sup>③</sup>以上研究说明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但是其中许多史料有待进一步发掘，其丰富的内涵有待进一步阐释。其实，梁启超在其文章和专著中屡屡使用“文献学”一词，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阐释，提出了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原则、标准等。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微发幽，还原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从而客观评价他对文献学的开创之功。

### （一）“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提出

下面先列表举出梁启超的文章和专著中提到“文献学”（包括“文献

① 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图书与情报》1999年第3期，第12页。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谢灼华：《中国近现代学者文献观之发展》，《图书情报知识》1994年第4期，第3—5页。



之学”、“文献学问”、“文献的学问”）一词的句子。

专著或文章	写作时间	提到“文献学”的句子	出现次数
《清代学术概论》	1920 年 10 月	1. 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	1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 年 1 月	1. 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2.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 3.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4.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道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	6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1923 年 4 月	1. 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 2. (甲)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 韵文书类，(丁)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 随意涉览书类	2
《读书法讲义》	1923 年 8—9 月①	1. 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 2. 第二部门的文献学，虽说他包含国学知识的全范围，亦无不可。 3. 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 4. 这种研究法，我认为治文献学惟一法门，不如此做，便非学问。 5. 他们所致力者虽仅在古典方面，然而这种精神应用于各种文献学乃至自然科学，皆可以“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也。	5

① 关于《读书法讲义》的写作或出版时间，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所收的该文后只注明出自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并没有注明出版时间，想必夏氏看到的该文是没有注明出版时间的。但是文中已提示了该文的写作时间：“我两年前著过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明该文作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后两年，《中国历史研究法》系 1921 年秋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因此《读书法讲义》应作于 1923 年。另外，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提到，梁启超 1923 年 8—9 月作《读书法》一文，并加按语说：“是年（1923 年）9 月 25 日《〈饮冰室合集〉长编》为‘15 日’致张元济：‘一月前寄上《读书法》前半篇……后半篇近数日续成……明日入京当先抄上’。（《长编》）”。查《饮冰室合集》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并无此文，按笔者推测，李氏说的《读书法》应是《读书法讲义》的异名，因为两者都作于 1923 年，且夏氏所辑《读书法讲义》是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的教材，教材在“读书法”一名后加“讲义”二字是正常的。因此，笔者将《读书法讲义》的写作时间定于 1923 年 8—9 月。参见：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63、1367 页；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9—220 页。



专著或文章	写作时间	提到“文献学”的句子	出现次数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1923年	1.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	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3—1924年	1.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2. 次则古史书、地理书等之研究，足以补助文献学的也不少。	2
《儒家哲学》	1927年	1. 一个是吕东莱，吕家世代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吕家所传中原文献之学，一面讲身心修养，一面讲经世致用，就是我们前次所说内圣外王的学问。 2. 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继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 3. 全祖望（谢山）学问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乃是文献方面，由黄梨洲而万季野、邵念鲁，由万、邵而全谢山，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学风，致用方面，远绍宋代吕东莱一派文献之学，修养方面，仍主阳明。	3
合计使用次数			共20次

从上表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儒家哲学》等7种专著（或文章）中共20次提到了“文献学”的概念（其中，“文献学”15次，“文献之学”3次，“文献学问”1次，“文献的学问”1次），从概念提出的时间看，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1923年。梁启超不仅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了“文献学”的概念<sup>①</sup>，而且于1923年在《读书法讲义》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文献学”的概念<sup>②</sup>。所以说，梁启超既是“文献学”，又是“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 （二）梁启超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及研究意义

梁启超没有给“文献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已大致确定了其基本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2页。



内涵。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sup>①</sup> 又在《读书法讲义》中说：“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sup>②</sup> 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属于国学最主要的部分。同时，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又认为，治国学有两条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sup>③</sup> 在梁氏看来，文献学是与德性之学（即身心性命之学，也就是生命的学问）相对而言，就是说，除德性之学外，其他的国学都是文献学。梁氏在《儒家哲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继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sup>④</sup> 梁氏认为，黄宗羲（黄梨洲）承继了两种学问，一是陈（亮）、叶（适）的文献经世之学，一是王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文献经世之学就是文献学，即史学（指广义的史学）。这里，梁氏也是把文献学与德性之学（即身心性命之学）相提并论。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进一步解释，文献学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sup>⑤</sup> 综上所述，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与德性之学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全部内容。也可以说，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指“古籍整理”的学问，几乎相当于当时的国学。

古籍整理，最重要的是史料。因此，梁启超有时又将文献学与史料学紧密联系起来。如他说，明清各大师大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文献学），他们（如潘力田、万季野）的史学特点与以前重视“书法”不同，而特别重视史料，“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

①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②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55页。

③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0页。

④ 梁启超：《儒家哲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第67页。

⑤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0页。



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的功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八九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sup>①</sup> 也就是说，他们的史学不同于以前的史学，而是“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而文献学在此主要是指史料学方面的内容。此外，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第二部门的文献学，虽说他包括国学知识的全范围，亦无不可。例如和第一部门（指身心性命之学——笔者）同性质的书，有许多应用到修养上没有什么价值，但用来作思想史的资料，便有价值。和第三部门（指文学——笔者）同性质的书，有许多作品没有什么鉴赏价值，但用来作文学史资料，便有价值。章实斋说：“六经皆史。”编述六经的人，是否目的在著史，虽不敢断言。但我们最少总可以说“六经皆史料”。把所有书籍都当作史料看待，无论什么书籍都有用。何止书籍，乃至烂帐簿、废田契、破搢绅、陈黄历……等等都有用。<sup>②</sup>

梁启超在此也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论述文献学的，认为所有古代典籍甚至“烂帐簿、废田契、破搢绅、陈黄历”都可以当作文献史料来看待的，都有史料学（或文献学）的价值。因此，他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sup>③</sup>。梁氏在此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古代典籍都当作文献学的研究史料，是从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角度看待古代典籍的。再如，他对《左传》的看法亦是如此。他说：“《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sup>④</sup>

<sup>①</sup>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96、9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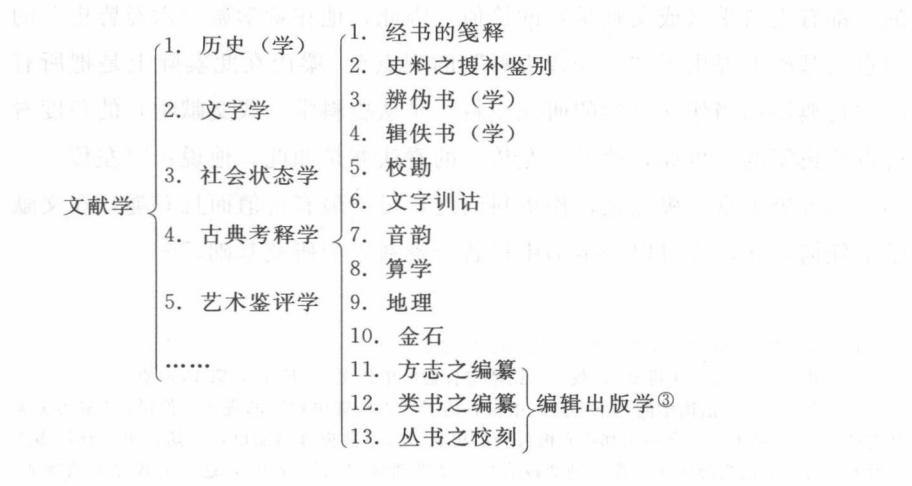
<sup>②</sup>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 1360 页。

<sup>③</sup>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也表达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他说：“拿历史家眼光看来，（史部书）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何只（应为“止”——笔者）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 111 页。

<sup>④</sup>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第 58 页。



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的内容极其丰富，范围非常广泛。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他列举了文献学的一些子目，如历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这些只是举其大略，其实还有许多，他并没有完全列出来。他说：“以上几件，都是举其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sup>①</sup> 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实际上包含了三级分类。关于古典考释学，梁氏认为，前清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这种学问也就是指清代的考据学。他还在《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中，提出一个概念叫清代的“古典考证学”，然后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将其概括为“科学的古典学派”。其实，这三个概念（“古典考释学”、“古典考证学”、“科学的古典学派”）指的都是考据学。梁启超将“科学的古典学派”的主要研究工作，列举出 13 种：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sup>②</sup> 其实，以上列举的 13 种研究工作，实际上可以视作是梁启超对古典考释学这一的学科的初步分类。这样，梁启超对文献学的三级分类，可以还原如下：



①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 112 页。

②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21、第 25—26 页。

③ 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属于编辑出版学的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的文献学体系是粗疏的，如文献学的二级分类，并没有列举全，三级分类也只说到了古典考释学的分类（其分类也并不很科学），而且二级分类中，文字学与古典考释学并立，古典考释学的三级分类中又有文字训诂。这说明梁启超对文献学体系的思考并不成熟，只是初步的探讨，但是在“现代”文献学的发轫期，这一体系的建构已经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除确定文献学的内涵和范围外，梁启超还指出了文献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梁氏前期对中国文化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但其精力主要致力于西学的引进和传播。而1919年欧游之后，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极大的自信。因此，他晚年主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即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梁氏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献的价值，并认为应让国民了解本国文献，因此认为文献学非常重要。他说：

我们若相信环境和遗传的势力，那么，这门学问（即文献学——笔者）之紧要，不必更加说明了。我们做宇宙间一个人，同时又做国家底下一个人。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我们祖宗曾经做过什么事，所做的事留下好的、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共有多少，这是和我们现在、将来的命运关系最切之问题。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业，都要看准了这些情形才能应付。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这部分学问自然更重要而且有趣味了。<sup>①</sup>

在此，梁启超认为，文献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使国民察知现代生活与过去未来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

<sup>①</sup>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55页。



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sup>①</sup>因此，梁启超的文献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强调学以致用，即为国民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

但是，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典籍之多之难读，竟至于青年要了解中国的文献常识居然找不到合适的书读。他说：“我们最痛心的是：想举几部文献常识，惬意得当的书给青年读，竟自举不出来！我想这是国学先生们当面的责任，若不赶紧编出几部好书来，实在是对不起青年。”<sup>②</sup>因此，在梁氏看来，文献整理在当时乃当务之急，“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sup>③</sup>在此，梁启超指出了文献学研究的迫切性，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梁启超一生非常重视研究方法，认为“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的研究法”。<sup>④</sup>他对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多有探讨。首先，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其次，还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此二书是梁启超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实际上也可以视作为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探讨，特别是前者尤其如此。此外，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也论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下面综合上述材料来论述梁启超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梁启超认为，文献学研究可开拓的领域很多，只要方法得当，就会有研究成果。他说：“文献各部分之专门研究，前途可开拓的境土甚多。正如一个极丰富极辽广的矿区，矿苗到处分布，层层堆积，只要你有方法开采，分析，制练，便可以生出许多珍奇高贵的产品。”<sup>⑤</sup>他认为，文献学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0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第1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8页。

⑤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1页。



的各个领域：“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的研究法”。<sup>①</sup>总的来说，“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sup>②</sup>具体来说，文献学研究有下列五大原则。<sup>③</sup>

“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会做学问的人，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梁启超认为，“问题意识”是文献学研究的第一步，其实也是一切学问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发生问题”呢？梁启超首先分析为什么不发生问题，“第一，以为是当然的道理，不值得注意；第二，以为前人久已定论了，何必更费心。”然后再分析如何“发生问题”。他说：

朱晦庵说：“学贵善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善疑便是排除“故见”的第一法门。无论读什么书，听什么话，看见什么事，你疑他一下不会蚀本。所谓疑者，并不是一疑之后从此便不信；因疑得信，也是常有的。但这回的信，却是有责任的了，有意识的了，不是故见而是新见。总之，一疑便发生问题；发生问题便引着你向前研究；研究结果，多少总得新见。<sup>④</sup>

总之，梁启超认为：“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必须“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sup>⑤</sup>梁启超在总结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研究方法时，描述了“发生问题”的具体过程：

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

<sup>①</sup>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1页。

<sup>②</sup>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0页。

<sup>③</sup> 以上三处引文见：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1—1362页。

<sup>④</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功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sup>①</sup>对于问题的发生，梁启超还列举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以供青年参考，如万斯大的《周官辨非》、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崔适的《史记探原》。梁氏认为，这几部书“发生问题”异常大胆，可以做如何“发生问题”的模范。

“第二，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千万颗沙里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颗金，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那么，你除非不想得金便罢；想得，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sup>②</sup>梁启超认为，“搜集资料”极有意义。因为“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轻重，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sup>③</sup>又认为，“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四五十岁以后才成功的。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销磨在搜集资料里头。”因此，梁启超非常重视材料的搜集工作，并总结了“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如何应用此类方法。关于“搜集资料”的方法，首先，他认为提出问题之后应以问题为中心去“搜集资料”。他说：“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睹；既有问题以后，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做基本资料；以后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其次，要勤劳做笔记。他说：“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再次，先做丰富的“长编”，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5—46页。

②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2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9页。



再做简洁的定稿。<sup>①</sup>

至于如何应用此类方法，梁启超认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之兴味。”<sup>②</sup>这一点梁氏在论“发生问题”时也提到了，即上文所说的“注意”。其实，“发生问题”和“搜集资料”有时很难分开。因此，梁启超在论述两者时均强调“注意”。梁启超之所以提出“搜集资料”要勤做笔记，其目的还在于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即注意力）。他说：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资料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功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sup>③</sup>

“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梁启超举例说，自己为求“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这一断案，竟费去一年数月的精力，可见“搜集资料”须用极耐烦的功夫。“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得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成为学问。”<sup>④</sup>

最后，梁启超指出，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清代学者已善用之，如王

<sup>①</sup> 以上三处引文见：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2、1363页。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1页。

<sup>③</sup>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25页。

<sup>④</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1页。



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是最好的模范。梁启超的研究法实际上是总结清人研究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的结果<sup>①</sup>。

“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那里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中国书假货极多，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sup>②</sup>对于史料（资料）的鉴别，梁启超首先总结出一个大原则：“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sup>③</sup>但是历史上的事实并非都如此简单，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的反证以推翻之。对于此类史料，梁启超认为，“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个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sup>④</sup>对于“鉴别史料（资料）”的具体方法，梁启超认为，“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因此，“鉴别史料（资料）”的方法，相应地分为两种：一是正误的辨别法，一是辨伪的鉴别法<sup>⑤</sup>（关于后者，详见第四章第二部分，此处从略）。

对于史料正误的辨别，非常复杂，梁启超论之甚详。首先从原则上讲，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地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认为第一等史料。”但这仅仅是鉴别的大略标准，具体应用时，当分别观之。例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料，战时所记为断片的史迹，不如战后经过比勘而得的完美可观的战史；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不如有常识的新闻记者所记，奔走战线仅有常识的新闻记者所记，不如安坐室中

<sup>①</sup>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举自己研究的五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搜集史料。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9—70页。

<sup>②</sup>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363页。

<sup>③</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9页。

<sup>④</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9页。

<sup>⑤</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7、89页。